

学 | 术 | 史 | 从 | 书

秦燕春 著

清末民初的 晚明想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秦燕春 著

清末民初的 晚明想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秦燕春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
(学术史丛书)

ISBN 978-7-301-14863-1

I. 清… II. 秦…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1363 号

书 名: 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

著作责任者: 秦燕春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林胜利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863-1/G · 25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6.75 印张 448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衷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

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只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1998年8月4日

自序

“站着读书”与“三十而立”

能在我离开北大 2 周年、弃医从文 10 周年,尤其在北大 110 周年校庆的年尾、下个新年钟声敲响之前,在母校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无疑是一种荣幸。

10 年前(即 1998 年)的某一天,我离开医学院,在北大东门附近,租下一间小屋的一张床位,准备报考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

小屋所在的那块地皮,现在已经夷为平地、建成广衢,而当时还鳞次栉比排列着许多民居,都是平房,我住的那个大杂院,还有个颇为古意和雍容的大红门。

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读北大的学生,应该大多都还记得那片杂和着古旧与脏乱的胡同。“雕刻时光”的电影与咖啡也散落其中——多年以后,我偶然认识了其创始人的一位四川籍画家朋友,才晓得“雕刻时光”的诞生,缘于一个台湾与湖南之间浪漫的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情感故事。

还有老万圣书园，也坐落在那片民居的深处，是临街相对的两处房子，石头圈起的粗粝门面，但给人许多温暖和踏实，仿佛提升了书的质地。新万圣书园现在搬到了蓝旗营，一切的装修瓦光靓丽丰满华贵，书也变得洋气起来。我反而去得少了。

很可能我是这片民居中出没过的最后一支“考研部落”的一分子。我考入中文系之后不久，那片房子很快拆迁，没有等到下一季“考研大军”重新啸聚成为规模。

记得当时北大东门附近还有一家小酒馆，大大的招牌，名唤“东篱园”，现在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那时我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迂徐与幽闲。

那时我在那只浩浩荡荡的“考研”大军中，只占有的一张床位。

确切地说，这张床位是一只北方乡村常见的双轮“地排车”的车架部分。在“床”的一端，还可看得出车辕的痕迹。

但即使是这只作为“床铺”使用的车架，在我考研前三天，它还是在正中部位断裂了，开始向外缘倾斜，这使我的卧姿不得不保持一种时刻绷紧的劳累，以防止身体的下滑。我是用一摞砖头把“床腰”折断处撑起，继续睡在上面，完成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的。

当时我的体重只有94斤。这张“床”的脆弱可想而知。

也许这一节经历实在太触及灵魂了，以至此后多年当中，我都很习惯地自称：我是一个“学术民工”。

那个小屋的床位可以入住三个女孩，大家均“号称”考研，但其中两个中途撤退，又换了两个，又撤退，因此我先后有过四位室友，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到从这里搬到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宿舍。

她们其他两张床，都比我的“床”好。至少，它们是从商店买回的真正意义上的床。

也经历过房东租金如印花税一样偷袭暴涨的“讹诈”。

北地京城的大杂院还保留着四合院的背影，小屋窗外有一棵枣树，秋天落了黄叶红果下来。房东有一只极肥大的花猫，似乎就叫“花花”，但我入中文系读书前不久，“花花”走丢了，房东太太为之怨恨许久，她推想中的案

件结论是，花猫被“河南人”抓走并吃掉了。

隔壁仿佛就是未名湖。

我经常听见湖边林子深处，有一只孤独的布谷跳跳地叫：“光棍好苦！光棍好苦！”我考入中文系之后住研究生宿舍，听见它似乎依然叫了很多年。

在这段“学术民工”生涯中，有一节不算情事的插曲不妨一提。

据房东太太给我打的小报告，隔院另外一只考研男生大军中（我们那时住得保守到近乎讲究，大体主动按性别分租院落，根本无法相信“异性合租”的可能），有个男孩在暗暗喜欢我。

如今很多年已经过去，内心深处我一直颇为感激这个我从来不曾认识的男孩（我本人并不知道他是男军中的哪一个）。在那个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清冽的冬天，两件花格衬衫、一条蓝牛仔裤、一件长及脚踝的烟青色棉服是我唯一的服装，为我对付过所有的白天和黑夜。我压根儿想不到，还有男生会如此“慧眼”，注意到我内秀的青春。

1999年5月3日，当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面试的日子，至今我都觉得，那是我今生最幸福的一天：我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明清文学方向唯一被录取的外校考生，师从刘勇强先生。同专业另一位男同学吴献雅是北大保送的，他是夏晓虹先生的学生。

平心而论，3年之后，2002年我再度转行，考入现代文学专业师从陈平原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更多感觉是学术探索之旅上顺理成章的转换，心态要安静、平和得多。

只有1999年那个春天。五院的紫藤盛开的日子。那天几乎攫取了我此生至今最大的幸福感。

也许只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孤军奋战，近乎冒天下之大不韪，完成一个“医学——文学”的转型，太冒险了。

的确也非常艰难。

尽管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完成这样转型的人很多（“医学——文学”在人类文明史上似乎一直存在一点神秘的血脉关联），其中也不乏极优秀者，我只不过是其中很不起眼的一个，但对于我的平凡的个体生命而言，

这样的因缘只有一次，而且不可重复，一切都属于“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生命之旅。

7年之后。2006年6月3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正式答辩。我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对鲁迅卓有研究的孙玉石先生，后来曾问过我一个其实很多人都已问过我的问题：从医学到文学，这么大的改变，感觉怎么样？

实在话，这种改变，其中甘苦得失，春江冷暖，一言难尽——尽管“文学史上的‘弃医从文’现象”差一点成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但在当时，我最后没有接受“医学与文学”这个选题。

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入彀太深则难以客观起来，无法做到一份纯粹的学术清明与理性制约；同时亦因为，曾经冰凉凉面对一个老人只存一目半鼻半嘴的半边头颅研究他的鼻腔结构的我、曾经眼睁睁亲历过心脏手术体外循环那颗欢欢喜喜跳动着的“裸心”的我，无法把现代医学留给我的问题，简单圆满就此交付给一个现代文学的选题。

很多年来，我总爱对自己反复说一句同样的话：

命运是一把牌。负责发牌的是命运之神。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我能尽之力就是：无论这把牌有多烂，把它打到极至！

弃医从文是我的命。我要打好这把牌。

如此而已。

我深知自己来自一个完全外行的领域、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天地，基础薄弱，根基不牢，这点“自知之明”让我成为一个还算勤奋的人。

1999—2006年，在北大中文系就读的7年当中（我的博士是四年制），每年至少有300天，我都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度过的。

我在站着读书。

我觉得我一直都在站着，站了很多年，站在书架前面，一本一本、一排一排，翻过去……翻山一样。我站着度过了我整个的青春岁月。

2006年孙玉石先生问及我这些年的感受的时候，我才开始思考：7年之后的我，与7年之前的我，区别到底在哪里？

多年以前,我还没有就读中文系的时候,偶尔翻到吴福辉先生的专著、也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前言中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其大意是说:一篇成功的学位论文,能够获得业界的认同,最重要的意义,可能首先不是它解决了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而是它让作者获得了一份继续往前走的信心与勇力。

2006年当我在北大中文系“站着读书”7年之后必须离开她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这些年来,我保持站着的姿态,在书山面前,原来一直都是在练眼力,其次是在练腕力。

当我必须离开北大母校远走的时候,我曾一次又一次徘徊在这攫取了我全部青春的图书馆(但我从来不曾后悔过这一攫取,甚至非常欣慰有机会被她攫取),我渐渐变得明白:7年之后的我和7年之前的我,最大的不同在于,我开始能够分辨“好书”与“坏书”的区别。

在这个印刷出版泛滥成灾,太多人在随意地、任性地、放纵地进行精神呕吐的时代,区分“好知识”与“坏知识”,甚至先于学习知识、掌握知识。

我开始明白,“站着读书”,应该是我生命的前三十年的一贯姿态。

这三十年,近乎一个穿越文明的垃圾堆的过程。在大堆的文明的历史物中,有丰富的营养,也有冒充文明的恶劣的有毒的东西。我以为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与“文明人”,都要首先掌握区分善知识与恶知识、好道德与坏道德、真文明与伪文明的能力。某种程度上,这个“穿越文明的垃圾堆”的过程非常必要。因为只有如此真枪实弹乃至“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般“打出山门”之后,我们所掌握的那种区分能力才是亲切的、可靠的、笃定的。

当然,在学会“区分”之后,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遥远、很艰苦。

我们还要学会选择、学会坚持、学会承担。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所有的后果:好的和坏的。

毕竟没有任何一条路是一马平川、没有风险的。

古人云:“三十而立。”

我对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就是:穿越文明的垃圾堆之后,我们还没有被打垮、被压垮,还能继续“站着读书”。

这就是我的“三十而立”。

作为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选择“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这样一个论题，很大程度上也是我穿越一些故垒之后的必然选择：我始终无法忘情于那些“不用白话表达的美”，我更耿耿于怀于那个清刚悲烈、堂堂正正的晚明，何以在后世的多数记载与追忆中，多数时候只有其声色犬马、纸醉金迷、香艳色情的部分得以被强调、凸现、放大。我在内心深处希图能够还晚明一个“公道”？

不过，对晚明、晚清两个本身都已十分混乱复杂的时段的兴趣与话题同时进行分析剖梳，显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有至少长达两年半的时间，我都是一个在汪洋大海中挣扎的不会游泳无处用力的孩子。尽管异常辛苦，毕业答辩时我却真心实意说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感谢这个痛苦的选题！她让我在我的年龄过足了读书的瘾！”

同样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陈平原先生，感谢他的宽容、慈和、睿智，最大程度容忍着我青涩的成长与尖利的棱角。

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围绕论文的写作与修改，前后发生过很多走投无路的故事，其激烈程度，有些是即使现在我也无能为力加以判断的。人的人间有着太多似是而非与似非而是。最终的审判只能属于神的意旨，但，在人的人间我们必须自己做出选择。

藉此机会，我很愿意谈一谈近年来在明清之际学术研究领域一位不可或缺的学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同门师伯”——赵园先生的著述。

对于一个认真（更为精确而不那么正规的词，是“较真”，较劲与认定，无疑前者更有力度、更大投入）的研究者而言，每一选题的取舍，是关乎疼痛的。

阅读赵园先生关于明清易代研究的系列著述，常有冰冷的疼痛掠过我的肌肤，这种疼痛的阅读，最能将我从历史的悠远窈渺中拎出：当黄宗羲愤慨不已君主“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故而导致“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明夷待访录》）的时候，当吕留良将士人自主性的丧失（“有进退而无去就”）归结为“封建废为郡县”的制度性后果（《四书讲义》）的时候，当王夫之敏感于举世人伦关系中的“市道”、“货贿”大行其道（《诗广传》）的时

候……我们还能说，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了么？恐怕诸如此类的“历史”没有过去且正在盛行当世的，还算多数。

这种“不曾过去”，也许正是赵园先生研究中疼痛感的来源。

某种程度上，赵园先生的研究对象们，不也正是明清之际落在汉族士夫身上“存华夏，亡天下”的文化失落的巨大疼痛，才刺激出他们对于以往政治与政权的深刻质疑吗？

先有正确的提问，而后才有出色的回答。好的学术问题，都该是撕心裂肺从生命深处喷薄而出的，敲骨吸髓地痛过，才有贴皮贴肉的好。这种饱含痛楚的举笔而后落笔，对于我，意义远在思维的活跃或者思绪的奢侈之上。总还痴痴地想着，生命应该、能够郑重起来、端严起来，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学问何曾能够完全外化于生命？！在一个举世容忍乃至追求平庸的媚俗的时代（还要名之为“多元审美”、“众声喧哗”……藉此为人性的堕落一次又一次凿开新的出口：殊不知，这种开凿之后所导致的千疮百孔的牺牲品，就是人性自身），重新返观一下“士文化”所留给我们的思考，此举近乎宗教行为。赵园先生所谓“士大夫的经世热情与有关的价值态度，至今仍活在知识者的灵魂中”，揆诸今日，近乎一厢情愿——但毕竟是一份美好的愿景。

后世之人，每一代人阅读晚明，都会“以自己所处的时代为参照系”，无论清代、近代、现代还是当代，即使“附会，即后世所做的意义延伸”，也是富有意义的。赵园先生明言：“我对于已有的几乎任何一种关于明末清初士风的大判断，均不无怀疑，认为那种判断很可能遮蔽了我们的视野”——因此，“搜寻‘风气之外’”便成了赵园先生从事明清之际士夫心态研究的十分鲜明的特色，而且斩获甚多。

赵园先生所选择的阅读方式，最为看重“难以述诸明晰判断”的“思想与经验之间”——晚明人物如何将“生命”刻写在了“历史”上——这样一种注重感同身受的“体验”式的阅读，创生了研究中的细腻、关切、温热。赵园先生坦承其研究明清士人考察正在“有关言论中的现实感、包含其中的热情与期待”，借助“个人经验”的深入展开，使得历史叙述获得额外的饱满与丰盈。无疑，正是这种对经验的敏感关注，化育并保持了赵园先生著述当中的疼痛风格。而明清士人关于自身困境的痛苦思考，即使“并未最终成为

酝酿新思想的酵母，那种思考因联系于生动的个人经验，而保有着使后人感到震撼的力量”——这不正是文学式样的研究能够“入人深”的独特的好处么？至于沉潜涵泳于能够提供当时情景、氛围的材料希图获得易代之际的“现场感”，或关注材料时特重能够提供“情态”与“精神意气”者，则无疑也当算作文学式样的研究用诸考究史料时能动人的好处、而非缺憾吧？对于若干习惯麻木、遍吐口水的学界现状而言，这种越界、疼痛与触动，总还不是坏事。

也许还可以粘一段赵园先生的学术自陈？

我讨厌故作悲壮，从来不说“献身”学术，把学术这种职业神圣化也神秘化。老舍说自己是“写家”，较为平情。前些年流行说“码字儿”，就有点矫情。学术不神圣，尤其不神秘，但在学术这职业的“从业者”，应当对学术心存敬畏。

.....

在北大读书的7年当中，我基本不发表文章（除了作为毕业任务的几篇之外），因为知晓自己正在穿越过程当中，眼力、腕力均很不自信。

毕业两年以来，陆续有论文、专著问世，亦为自感已是“三十而立”之年，对若干问题，关乎学问的与关乎性命的，渐有信心与能力有所表述与解决，因此留意发为文章，尽一份文化建设的薄力。

至于这些论文与专著（包括这本经由博士论文整理而成的专著），是否能够提供给读者诸君一点“好知识”与“善道德”，则要期待诸位的裁断。

毕业已经两年半多，本来此书可以更早一些出版，迁延至今，也是因为一点生涩的谨慎，总想尽力减少这个庞杂的论题当中难免掺杂的硬伤与软伤，对读者负责，更对自己负责——但饶是如此，在书稿付梓前夜，我依然胆战心惊，“上穷碧落下黄泉”般在寒风中奔走于北京各大图书馆，为了纠正那些防不胜防的疏忽与笔误——出版似乎永远是“遗憾的艺术”。

决定让我在今年出版此书的唯一的私人目的，还是因为10年前（同样是1998年），我的祖父在故里去世。父亲看我正狼藉备考，坚持没有让我回家奔丧。得知噩耗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北大文史楼下的公用电话亭里，捏

着已经挂断的话机，不管不顾，哭得惊天动地。

父亲是独子，六岁丧母，祖父一直没有再婚，因此父亲没有兄弟姊妹。到我们兄妹这一代，又只有我一个女孩，“两辈一女”，因此娇养。妈妈说，我小时淘气不爱吃饭，她生气欲打我，总是祖父抢先来把我抱走。

后因我少年离家，漂泊太久，祖父去世的时候，已经将近 10 年，没有机会再见过自己唯一的女孙。

祖父讳启贞，一生乡居，没有来过北京。但他去世之后他的魂灵曾从南方千里北上，走过这条他从未走过的陌生的长路，梦中来见我嘱我，很要紧的话，至今我历历在心。

仅以此书，献祭在祖父的灵前，愿他在大神的花园中，有春华沉香清迈，有恩慈待我依旧，有期待的心看我在人间，安分、宁谧、洁净、清平，走完属于我的一生、一世、一性、一命。

2008 年 3 月 8 日初稿

4 月 4 日（清明）二稿

8 月 28 日定于京师什刹海

目 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1

自 序 “站着读书”与“三十而立”/1

导 言 寻找晚明,一场叙说历史的话语盛宴/1

一 历史记忆的交响/1

二 幻中出幻的镜像/18

三 本书的纲领结构/24

第一章 从江湖到庙堂:晚清的“晚明三大家”/31

一 本土还是西方:“晚明三大家”的晚清命运/35

二 经典与广告之间:晚明著述的晚清出版/70

三 从边缘到中心:三大家从祀两庑始末考/83

第二章 “国族”还是“文化”:论“遗”/100

一 著述·演讲·躬行:章太炎的“晚明记忆”/102

二 忠于文化还是忠于君国:晚清的遗老们/126

三 郑孝胥的自我与取舍/143

第三章 论“士”与结“社”:历史的“写作”与“模拟”/161

一 “精神国粹”与国民楷模:“民史”建构中的
“明遗民录”/163

二 作为姿态的“几、复遗绪”:以南社为中心/193

三 清末民初社事中的“重”与“轻”/216

第四章 风流云散：晚明“艳迹”的黯然回眸	222
一 作为“经典”的“秦淮”记忆	223
二 “胜国沧桑艳迹多”：从《桃花扇》到《沧桑艳》	240
三 末造奇女：乱世的节烈与死亡	261
第五章 野史·小说·名物文章：文体决定下的内容	289
一 晚明“野史”：作为“民间记忆”的“乡邦文献”	290
二 “小说”晚明：寄托遥深与作意好奇	305
三 名物文章与家族记忆：以冒鹤亭为中心	324
第六章 寓教于乐的尴尬：走向“通俗”的晚明叙事	342
一 启蒙·改写·消费：当革命遭遇日常	344
二 《明末遗恨》演出前后：改良史剧及其他	359
三 1915年：新剧的“晚明”	375
尾 声 回归书斋的“晚明想象”	382
主要参考文献	389
附 录 “国粹学派”主持出版的明末清初典籍简目	401
后 记	406

导 言

寻找晚明,一场叙说历史的话语盛宴

历史记忆的交响
幻中出幻的镜像
本书的纲领结构

一 历史记忆的交响

时间回到上一个“世纪之交”,正当清末民初几十年间,本来早已成为历史记忆的“晚明”的事件与人物,突然间又被反复重提。上至满清王朝政府,下至市井细民百姓,更毋庸提及掌控着当时话语霸权与发声渠道的新、旧知识人,从朝廷议案到报刊杂志,从建祠立庙到戏剧演出,其参与人数之众多,言说方式之差异,讲述内容之分歧,都足以使得这一时期“寻找晚明”